

# 自序

## 一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 從守舊的一邊倒到開新的一邊倒

庚子之變後，惲毓鼎撰述19世紀末期的時事和政潮，以「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sup>1</sup>為總論。說的是因「甲午之喪師」而有「戊戌之變政」成為這個過程的起端，之後一事與一事的「一貫相生」，便演為順康以來兩百五十多年間從未有過的「晚清朝政之亂」。<sup>2</sup>當日身在東南的甘鵬雲所見略同，而言之更加具體和連貫：

戊戌八月以前，一維新之局也；戊戌八月以後，一守舊之局也。維新之極不恤，舉祖宗法度，一切紛更之。新進持權，忽棄老成，老成側目，於是新舊兩黨界畫鴻溝，如冰炭之不可復合矣。忌太后持重，頗礙新法進行，謀脅太后以兵事，未成而謀泄。太后垂簾訓政，六君子授首，康、梁遠遁，而維新之局終，守舊之局自此始矣。人則守舊之人也，思想則守舊之思想也，政策則守

- 
- 1 惲毓鼎：《崇陵傳信錄》，載章伯鋒、顧亞主編：《近代稗海》第13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94-495頁。
  - 2 張謇：《張謇全集》第5卷(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50頁。

舊之政策也。守舊之極，遂至恃邪匪以衛中國，仗妖術以敵列強。

其間以主事者的「固執一己頑固之見」主導一時，而成當日朝局之「群昏當軸，不達時變」。<sup>3</sup>就譚毓鼎所說的「一貫相生」而言，則這個過程由「維新」一面的進攻性開始，而一旦事勢翻轉，則變為「守舊」一面的戾悍。之後是中外開釁，外來的暴力恣肆橫行以入，打破了這種「頑固」和「群昏」。秋瑾直白地謂之「闖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sup>4</sup>衝擊自外而來，起於戊戌八月的這一段「守舊之局」遂在庚子與辛丑之交分崩離析。於是19世紀終止於這種分崩離析，20世紀開始於這種分崩離析。

從戊戌到庚子一路動盪劇烈。張謇後來統括而言，指述這一段歷史「始於宮廷一二人離異之心，成於朝列大小臣向背之口，因異生誤，因誤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惡，因惡生仇，因仇生殺。惡而仇，故有戊戌之變；仇而殺，故有庚子之變。戊戌仇帝，仇小臣，卒仇清議；庚子殺大臣，殺外人，卒殺無辜之民」。<sup>5</sup>而就這個過程起端於「守舊之局」推倒「維新之局」，並以「新舊兩黨」之勢如「冰炭」為既定之勢來說，則由戊戌的「惡而仇」走到庚子的「仇而殺」，實際造成的已是守舊壓平了開新，而以放手掃蕩之勢形成了一邊倒。當時刑部郎中左紹佐致書大學士徐桐說：「佐生五十有四年，目睹洋務之壞，幽憂憤鬱，以迄今日。幸得逢聖武天斷，一掃埃氛，「豁然如沉疴之得蘇也」。並且主張「既廓清腥穢，則凡電桿、鐵路、商務、礦務，一切可以引致洋人之端，皆當禁而止之」，<sup>6</sup>其言之斷然正映照了這種守舊的一邊倒之下，既不能容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義和團史料》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846頁。

4 郭延禮、郭綦編：《秋瑾集·徐自華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71頁。

5 張謇：《張謇全集》第5卷（上），第450頁。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義和團史料》上冊，第230頁。

忍變法維新，也不能容忍此前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的借法自強。這個過程隨「聖武天斷」而走向極端，但當外來的暴力逼入中國，並與之直面相逢，又在極短的時間裏直接打斷和碾平了這種極端。之後是作為暴力的延伸，庚子與辛丑之交的八國聯軍挾戰勝之餘威指索「禍首」與懲辦「禍首」，則此前居有權勢而主導了這個過程的人物都已圈入了被指索、被懲辦的範圍之內，隨其各自跌撲而霎時消失於權力所在的朝局之中。以歷史內容而論，辛丑之於庚子，正成了一種全盤倒轉。與之相伴而來的，已是另一種動盪劇烈。

敘述這一段歷史的《庚子記事》按聞見作實錄，敘述京城的時事，其中「辛丑正月」的一則說：

初八日，今日菜市口斬理藩院尚書啟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護送囚車，彈壓法場，皆是各國洋兵，約數百人。去年殺立山諸公時乃數千義和團護決，今則數百洋兵護決，世界變遷令人浩嘆。<sup>7</sup>

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在同一天記錄了菜市口的同一個場面，然後引申而論，言之慨然：

戊戌所殺者，除楊侍御[楊深秀]外，皆南人也，今皆北人。戊戌皆漢人，今除天水尚書[趙舒翹]外，皆旗人也。戊戌皆少年新進，今則皆老成舊輔，反手覆手，頃刻間耳。<sup>8</sup>

前者以辛丑年間的法場比庚子年間的法場，尤著意於由義和團「護決」到洋兵「護決」的「世界變遷」之天翻地覆，並從這種「變遷」中明白地看到了外力在中國的極度伸張而居高臨下，及其極度伸張和居高臨下的無可阻遏。後者以辛丑年間的殺人比戊戌年間的殺人，並由「南人」與「北人」、「漢人」與「旗人」、「少年新進」與「老成舊輔」的對舉和對照，以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庚子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71頁。

8 中國史學會：《義和團》第2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1年，第477頁。

抉示南北、漢旗和少年老成之各成對待，背後則都是四年之間開新與衛舊的爭鬥激烈和戾氣瀰漫，而其間起落無定，殺人者最後又成了被殺者。前者的記述和後者的記述各從一個方面省視這段歷史，又彼此對應地說明：當初著力壓平了開新一方的「守舊之局」，此日在外來暴力的橫掃之下一經掙擊，便已聲光俱熄，蕩然無存。梁啟超描摹其時的人心與世相，說是「辛丑、壬寅之後，無一人敢自命守舊」。<sup>9</sup> 與之因果相及的，則是曾被壓平的開新一方勃勃然重起於辛丑、壬寅之後，化其新學新知為時論、策論、呈文、奏議，之後又影響廟堂，進入了詔書之中。由此形成的獨步一時和無可匹敵，便實際地造就了開新的一邊倒。

就其立意而言，守舊旨在維繫中國之固有，以期存本根；開新旨在以西法變中國之固有，以期應世變。兩者各有自己的理由。但就實際的歷史過程而言，則由戊戌到庚子守舊的一邊倒，在辛丑、壬寅之後亟變而為開新的一邊倒，又是在外力鑿入新舊之爭的衝擊下實現的。因此，自一方面而論，新與舊之間的這種此長彼消並不是中國社會自然發生、自然演化的結果；自另一方面而論，與外力衝擊相伴而來的獨步一時和無可匹敵，同時又在使開新的一邊倒一經生成，其引為大法的西學西政猶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中，便已居有強勢。當此甫受重創而「國勢日蹙」，致「政府焚脊於上，列強束脅於外，國民怨讟於下」<sup>10</sup> 之日，遂能以其弘彰西法震盪四方，牽引朝野，攝動人心。隨之是時人所見的「今之見曉識時之士，謀所以救中夏之道，莫不同聲而出於一途，曰歐化也」。<sup>11</sup>

以「歐化」說西學、西政、西法、西藝之於「中夏」，則對應的顯然已是一種西學、西政、西法、西藝的當頭籠罩了。而「莫不同聲」和「出

---

9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45頁。

10 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下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第1055頁；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49頁。

11 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上冊，第52頁。

於一途」，又說明了時人之識時務者相信「歐化」為理所當然者的廣泛和眾多。與這種由開新到「歐化」的思想走向同在一個過程之中的，是「辛丑、壬寅之後」，在新政名目之下延接戊戌年間維新變法被截斷了的理路，直接促成停科舉、興學堂、練新軍，其除舊布新之際，一以「東西洋」所已經有為應當有，以「東西洋」所未嘗有為不可有。之後又越過了當初戊戌變法所籌想的範圍，行之更遠地變官制、立諮議局、設資政院、力行城鄉地方自治，以自上而下的「改弦更張」節節鋪展，統名之為「籌備立憲」和「咸與維新」。<sup>12</sup> 由此促成的既是一種劇變，又是一種急變。就程度而論，兩者俱為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西交衝所未曾有。而後是自60年代以來的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的借法自強過去之後，劇變和急變交作之下，清末最後十年開始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另一個歷史階段。

三十年借法自強以製器、練兵、鐵路、開礦、航運、電報等等為重心，移來的西人之「長技」大半都在形而下一面。雖說其間已經有清流與洋務的紛爭和頡頏，但與形而上者謂之道相比，這種由形而下的器所帶來的今時不同往昔，仍然脫不出中國的倫常名教和文物制度而能別開一局和另成一路，於是而有三十年之間中體西用提調借法自強的可能和事實。迨「甲午之喪師」，而後戊戌「維新之局」起於時移勢遷之際。「維新」而以「變法」立宗旨，本在於對比此前三十年的借法（自強）之改變中國的程度有限，以表達對於這種有限程度的否定和超邁。而辛丑、壬寅之後的清末新政既以延接戊戌變法的理路為起點，則其「採列邦之良規」以「維新更始」<sup>13</sup> 的大幅度改制和易法，便一定會從形而下延伸到形而上。與上一代人的製器、練兵、鐵路、開礦、航運、電報等等移彼邦之器為中國之器，而西用猶在中體提調之下相比，科舉、學堂、官制、諮議局、資政院、地方自治和立憲政治之舉「中國之法度」以「比照各國

12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169頁。

13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67、96頁。

之法度」，而「欲盡去舊法」<sup>14</sup>的急迫興革，則都會以變制不同於變器的衝擊之彌廣和衝擊之彌深，使久在一脈相延之中的中國社會被置於西法的分解組合之下失掉了本原。因此，當日直觀這個過程而眼界不為新政所囿的人已明白地看到：被稱作「舊法」的東西既生成於牽匯萬端之中，又存在於牽匯萬端之中，是以一旦摧折，同樣會牽匯萬端而引來四面傾塌。其時的一則論說於此尤其言之明瞭：

竊維一代之興，其官法制度皆非一時所能定也。自其初累世經營，皆身歷而手訂之，以積久而馴至於大備。雖後間有變革，而要不過進退損益於其間，故自秦、漢以訖於今，上下二千餘年，設官分職，相循不易，故語所謂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也。

「累世經營」和「進退損益」，都說明既存的制度和法度之所以能夠長久地延續和穩定地維繫社會，是制度和法度自身皆曾歷經漫長的過程，在既以社會為對象，又以社會為內容的不斷校正和深度應和中形成的。因此制度與法度雖外觀地出自「累朝聖君賢相經畫之宏」，而其本原和根脈則繫於中國人的社會、歷史和文化之中。相比於這種本原和根脈，權力和意願都不足以匹比和匹敵：

及至世變多故，禍難繁興，亦時有自奮私智以投時宜者，然其為政終不可行，即行之亦終不可久，苟強為之，亦未有不敗者。如唐之兵制，自張說而改，宋之新法，自王安石而行。其人皆學問深博，通曉古今，又值積弊之後，與可為之時，故專行不顧，欲改成法，以邀一切之功，而軍弱民弊，卒以釀異日藩鎮擅兵，宗社傾覆之禍。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張說和王安石都曾為糾弊而「改成法」，又都未見及成法內裏的牽匯萬端，而致舊弊未除，變法召來的新弊已不可收拾。這是中國人熟知的歷史舊事，然而以唐宋比此日，則「唐與宋之所改，不過數端而已，其為

14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140頁。

禍之烈已如是，若如今立憲之議，則是舉歷世相承之官法制度，盡取而紛更之，其造端之大，固十百於唐宋也。<sup>15</sup> 其著力表達的都是此日推想後來的一派憂患。

時當「論者皆謂憲政一行，可以強國」<sup>16</sup> 之日，這些論說關注的並不是未經實證而猶在嚮往之中的「強國」之願景，而是正在「維新更始」名義下施行「如今立憲之議」的實際過程，以及這個過程所造成的現實中國與歷史中國的斷裂。就「歷世相承之官法制度」由「累世經營」而「大備」，由「進退損益」而經久，遂成其「相循不易」和「百世可知」而言，則「經營」與「損益」的過程之自然而然和不得不然都說明：歷史中的「制」與「法」前後之間常能一脈相通，既在於其同以中國人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為最直接的依傍，也在於其同以中國人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為最穩定的內核。由此構成的確定性與具體性，便成為制度與法度「相承」和「相循」的實際內容，而牽匯萬端的本義即在於此。因此制度和法度不是懸空的東西，其中含結於深處的穩定內核和根本依傍尤其無從自為願想地切割分解。然則以千年歷史的「相循不易」對比十年新政的「盡取而紛更之」，顯然是時至晚清末期，「歷世相承之官法制度」被牽入「立憲之議」而置於「各國之法度」比照之下的過程，同時又是一個「官法制度」之中由「累世經營」與「進退損益」沉積而成的內核、依傍、確定性、具體性，從而社會、歷史、文化與「官法制度」的聯結，都被東西洋學理消解掉和過濾掉了的過程。而後是曾經延接千年的制度和法度，在當軸的眼中全成了抽象的東西和沒有確定內容的東西。

當時人記述說：「此次編定官制」，實際「主其事者不過一二人，而主筆起草亦只憑新進日本留學生十數人」。其間的汪榮寶「清末以留學生為顯官，共曹汝霖等見稱四大金剛」，曾「一年間擢民政部參議」，並「兼

---

15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113、151-152頁。

16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227頁。

憲政館、法律館、資政院事。一時所謂新政條教，出榮寶手者十九」<sup>17</sup>為尤其顯目。而比借助於「留學生」取法東西洋更加直接了當的，還有籌備立憲之日，「新定法律草案出自日本律師岡田之手」<sup>18</sup>的記述。「新政條教」之「出榮寶手者十九」和「法律草案」之出「日本律師岡田之手」，都說明其時新制度和新法度徑情直遂地取代已被抽象化與空洞化了的舊制度和舊法度之輕易簡捷。這個過程急速地改變了中國社會被稱為上層建築的那個部分，然而與之相對而見的，則是作為中國主體的民間社會，以及生存和延續於其間的萬千蒼生仍在「四千年舊習」<sup>19</sup>之中，並沒有隨東西洋學理而變。兩頭之間形成的不僅是分明的差異，而且是直接的相抵相格。後來的時論評議這種矛盾，說是歐人「所謂文明者，歐人之文明而非他族之文明；其所謂政治者，歐人之政治而非他族之政治」。<sup>20</sup>明言中國與東西洋學理和制度的不相對等，以及中國對於東西洋學理和制度的難以匆匆吞嚥而消受自如。但辛丑之後自上而下的「採列邦之良規」挾開新的一邊倒而來，由於無人「敢自命守舊」，這個過程便因沒有了與之力能對抗的對手，遂無須深究中西之間的學理、事理和人情物理，隨後是沒有理的制約，其時的開新、維新、變法、變制、籌備立憲都已很容易地成為一種既不識章法，又不知忌憚的馭勢而行了。主其事者的專注所及，並不在歐人的文明和政治與中國的不相對等，而全在歐人的文明和政治與富強對等，並因其與富強對等，而亟迫地移入了種種與中國不相對等和無從消受的學理和制度。作為一種歷史結果，清末的最後十年遂因之而成了晚清七十年裏以西法變中國聲勢最亟迫和震動最劇烈的時代。

---

17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443頁；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第3冊，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68頁。

18 胡思敬：《國聞備乘》，載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1輯，1985年，第292頁。

19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223頁。

20 經世文社：《民國經世文編》第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617頁。



## 二 「盡去舊法」與一個沒有本體與本位的中國

西法與中國的不相對等，是因為和二千年中國的文物制度相比，西法之於中國是一種沒有歷史的東西。所以，用西法變中國而能行之亟迫劇烈，與之相為表裏的一定會是歷史意識在這個過程中的節節式微和泯滅。于式枚說：

當光緒初年，故侍郎郭嵩燾嘗言西法，人所駭怪，知為中國所固有，則無可驚疑。今則不然，告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漢、唐、宋、明賢君哲相之治，則皆以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布立憲頌詞，至有四千年史掃空之語，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崙、華盛頓所創造，盧梭、邊沁、孟德斯鳩之論說，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諸人訪求而後得者也，則心悅誠服，以為當行。前後二十餘年，風氣之殊如此。<sup>21</sup>

從光緒初年的以西法比附「中國所固有」，到此日的「不知」歷史和「掃空」歷史，具見「前後二十餘年」的「風氣之殊如此」，正反映了以洋務為中心的三十年借法自強之日，一世之人心中仍然積存的歷史意識，在繼之而起的後一個時代裏已被漠漠然置於度外，日去日遠。就辛丑之後的中國而言，這是一種引人注目又牽動極深的社會思想丕變。而由此一路迤延，至民國初年黃炎培以「實用主義」為教育立宗旨，主張歷史一科的教與學，「除近世大事擇要授之外，全不取系統的」，只須「授以職業界之名人故事等」<sup>22</sup>為理所當然，顯然是其意中已全無數千年中國的歷史。作為對比，是同時的章太炎深惡自居於開新的人物一面「狂吠亂罵」中國「過去的事都沒有用」，一面又在讀「西洋史，記得希臘羅馬的事，記得一二百年前英、俄、德、法、奧、美的事」，視之為顛倒本末和逆

21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306頁。

22 經世文社：《民國經世文編》第7冊，第4171頁。

乎常理。並通觀當時，尤以「今人之病即在不讀史」為一世大患。<sup>23</sup>兩者立論不同，又以其立論不同的自為陳說格外真實地寫照了20世紀初年，歷史中國在人心中遠去的速度和程度。對於二千多年間歷史意識與政治意識常在一體相連之中的中國人來說，這種因「無一人敢自命守舊」而致布新走向極端、除舊走向極端的古今之爭已爭無可爭，帶來的其實是一個沒有歷史的中國。

于式枚以「駭怪」為詞寫照光緒初年中國人眼中的西法，說明了沒有歷史的西法進入自有漫長歷史的中國曾經窒礙重重。因此，產出於後洋務時代的這種沒有了歷史的中國，其接納沒有歷史的西法已經了無窒礙而正相對等。有此對等，隨後才可能有維新、除舊、變法、變制以所向披靡之勢急劇地改變中國。然而就中國之為中國而言，其本體和本位都是在歷史遷延中形成，由文化累積所化育的。所以，一個沒有歷史的中國，同時又成了一個沒有本體和本位的中國。與之對應，便是此前三十年借法自強恃為通則的中體西用，在辛丑之後的歷史變遷裏已面對潮流所歸的「一變舊制」而無從頡頏，日甚一日地淹沒於「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sup>24</sup>的另一種世情世相之中了。

當此沒有了本體和本位之日力行變法，則以西法改變中國便很容易成為「舉一事革一弊」，皆遠望外洋而「靡不惟東西之學說是依」<sup>25</sup>的澎湃騰達和漫無邊際。與之相隨而來的，是「靡不惟東西之學說是依」一定會引入各種各樣的西法，而西法之各種各樣，又一定會演化為西法之各是其是。於是一種因果促成另一種因果，作為當日真實的歷史過程，在開新的一邊倒已使新舊之爭爭無可爭之後，又見各奉一種西法和各成一種流派的新與新之爭接踵而起，以其各自獨尊發為各自恢張。比之新舊

---

23 章太炎著，章念馳編：《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5、433頁。

24 轉引自丁守和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5頁；第3集，第59頁。

25 轉引自丁守和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5集，第432頁。

之爭，其互鬥互克的聲勢又常常更加宏大。而後是同在立憲主張之下，朝野之間相爭相鬥；同在開新一脈之中，革命與立憲相爭相鬥；同以西學為源頭和歸旨，無政府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爭相鬥。此外還有國家主義、世界主義、軍國主義、集權主義、分權主義，以及由此派生而出的文明、公理、尚武、排滿、非聖、萬國新語和「無君無父無法無天」等等各立旨義，各自倡說，演化出彼此之間既不相勾連又無從勾連的種種新道理。然而以西法改變中國的過程倉促而起，既和此西法與彼西法的各式各樣一路相伴，又和此西法與彼西法的扞格爭鬥一路相伴，對於被改變的中國來說，這個過程便不能不是一種無序衝擊下的震盪。光緒末年朝廷展布籌備立憲，張之洞電告「軍機處釐定官制大臣」，陳述變法所到之處的地方一片亂象：

方今天災迭乘，民窮財匱，亂匪四起，士氣浮囂，外省之學堂無不思干預公事，攘取利權，海外之學生尤為狂妄，動輒上書政府，干預朝政，凌辱監督橫索錢財，電致本省督撫，抵斥地方官，及加查核，十無一真，其悖謬情形罄牘難書。而待舉之新政甚多，州縣外受督責，內憂賠累，疲於奔命，無米為炊。督撫支左絀右，救過不遑，但能撫綏鎮遏，平靜無事，已自不易。若改變太驟，全翻成局，需費太多，課虛責有，不惟官吏耳目眩惑，無從措手，權力改變，呼應不靈，竊恐民心惶惑，以為今日即是官民平權，刁民、地棍藉端鼓眾，抗糧不完，釐稅不納，緝盜匪則抗匿不服，籌賠款則抗欠不交，傳訊不到，斷案不遵，一切紀綱法度立致散亂逾越。國紀一失而難收，民氣一縱而難靖，恐眉睫之禍有不忍言者矣。

在清末最後十年，他曾是達官中的「於各種新政提倡甚力」<sup>26</sup>者，而「提倡」一旦移入實際的社會過程，則眼中所見的，是朝廷預備立憲所恃之

---

26 張之洞著，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1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562頁。

新法與「外省之學堂」和「海外之學生」手裏的新法不同；「州縣」與「督撫」奉旨而行的新法又會與「刁民地棍」引之以抗上抗糧的新法不同。新政召來的變化未見富強而先見學界亂、官場亂和民間亂，與其當初之「提倡甚力」相比，顯然都在意料之外。

若由此連類而及當時人記述中所說的「清末號為預備立憲，而政治污濁，一切設施舉措，多以促亡。蓋親貴之攘利權，巧宦之獵膺仕，均藉憲政為大好題目也。各督撫以風會所趨，亦爭言憲政以投時尚，政客、遊士麇集幕府，藻采紛披之電牘連翩競起，皆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而不顧政局如斯，病在根本」，<sup>27</sup>以寫照當時更加多見的「憲政」被用為「題目」的各利其利，則其間所持的新法之歧義紛雜又越益不可名狀和越益等而下之。就本原而言，被稱作「親貴」、「督撫」、「州縣」、「政客」、「遊士」、「學生」、「刁民地棍」的社會群類都產生於中國社會，存在於中國社會，並因之而原本都同在一種社會架構的縮連之中，又同在一種社會秩序的制束之下。有此縮連和制束，則個體、群體、整體的區分和合一，都因其身在範圍人人的公共性之中，而能夠確定地形成相互維繫的穩定關係。而後確定和穩定扶持了社會的安定，從而有眾生的安寧和安貼。然而這兩段文字以各色人等在新法名義下的各逞手段，互相分爭所促成的個體脫出了群體，群體脫出了整體的無從縮連和無可制束為事實，說明了西法之急劇改變中國，最先發生，並牽及人人的，是舊日各分等序而聚合人際，被張之洞稱之為「國紀」的社會秩序和精神秩序，在「一變舊制」和「盡去舊法」的群起攪動之下紛然解體。由此造成的四分五裂，與各逞手段，互相分爭相為表裏的，又是人在其中的「後顧無依，前趨無宿」，<sup>28</sup>四望紛然，又四望茫然。

與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的歷史過程相比，辛丑之後的中國人一面因「上年京畿之變，大局幾危。其為我中國之憂患者可謂巨矣」<sup>29</sup>的外力逼

27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第2冊，第515頁。

28 經世文社：《民國經世文編》第1冊，第457頁。

29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總）4727頁。

扼，而常在變法圖存之「急起直追，已患不遑」<sup>30</sup>的岌迫之中。一面又因外力以強暴致勝而剷除守舊化為思想震盪，已一變其「昔所視為夷狄者」，而為「今則帝天之矣」。因此，與「辛丑、壬寅之後，無一人敢自命守舊」相映而見的，是「庚子以還，國人由懼外而諂外」成為一種與歐化相伴而來的社會現象而格外引人注目。<sup>31</sup>其間被世人目為「新學之士」的群類，尤「以歐美一日之強也，則溺惑之，以中國今茲之弱也，則鄙夷之，溺惑之甚，則於歐美弊俗秕政，歐人之所棄餘者，摹仿之惟恐其不肖也；鄙夷之極，則雖中國至德要道，數千年所尊信者，蹂躪之惟恐少有存也」。<sup>32</sup>時至20世紀初年，正是前一種意識與後一種意識交相疊合，而致變法的亟迫與這種「溺惑」和「鄙夷」難分難解地主導了名為「新政」的過程。之後是起於變法圖存的這個過程隨西法一路疾走，而又並無定軌可循，與其「摹仿」和「蹂躪」的一派盲目相為因果的，便只能是現實中國與歷史中國的斷裂，出自上層的變制度和變法度與民間社會的脫節，以及個體和群體在無從縮連和無可制束中的四分五裂。所以，外觀地看，這個過程在追躡西洋和東洋的朝野共鳴中單面亢進，以前所未有的廣泛程度為中國造就了一種速成的近代化。然而與之共生的斷裂、脫節和四分五裂所帶來的社會深處的強烈震盪，以及同樣與之共生的因惶急而亟迫，由懼外而諂外的一時俱來和互相交纏，又在使當日中國的中外之爭和新舊之爭錯綜糾結，而致後一面常常淹沒了前一面，遂成其兩面之間的內涵漫漶模糊，外延也漫漶模糊。

以19世紀中葉以來外力俯視之下的逼扼困苦反襯此日的懼外而諂外，則比之社會深處正在發生的震盪，本來由中外衝突而生的創巨痛深，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外之爭和中外之界，在取西法以改變中國的單面亢進中淹沒於其時的「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已不能不算是中西交衝六十多年來人心深處的倒錯和異變。與速成的近代化之直觀可

---

30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258頁。

31 經世文社：《民國經世文編》第8冊，第5192頁。

32 經世文社：《民國經世文編》第8冊，第5073頁。

見構成了對照的，是社會深處的震盪與人心之中的異變都發生在內裏，對於那個時候的中國人來說，其直接的結果，都成了這一段歷史變遷中更多的挫折和更多的迷離。而一代人所經歷的這種世局動盪，則又明白地映照出速成近代化的反面。作為那個時候的事實，內裏和外觀的這種相互矛盾，同時又一定會成為互相制約，而致速成的近代化移西法於中國，不能不與重挫和跌蹶常相伴隨，而常在一路傾力奔走，卻欲速而不能達之中。然而同樣作為那個時候的事實，是西法的各成流派和各是其是，又自能以一種西法與另一種西法的此落彼起，促成了這個過程的一挫再挫而又前後相逐，不止不息。時人從清末看到民初，熟視既久，舉其間的人物和情狀，概而言之曰：「悚夫歐美革新之隆，謬欲規摹仿效，謂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慣一條一文，若移而殖之我，將旦暮可以強吾國。及為之而不效，則流血拚命以蕪之，革無效再革之，再革無效更革之。」<sup>33</sup>而後是現實中國與歷史中國的斷裂更深，出自上層的變制度和變法度與民間社會的脫節更甚，個體和群體的四分五裂更劇烈，人心中的倒錯和異變更明顯，從而當日的社會與速成近代化之間的矛盾和悖反也更加積困積重。

### 三 扶搖飄盪的過渡時代

這是一個社會、政治、文化都在層層分解中走向支離破碎的時代；是一個舊學衰落，新學紛爭的時代；是一個無從以體用、本末貫串連結的時代和社會沒有了中堅的時代。因此，這個時代既不同於兩千多年來傳統中國，也不同於此前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而著力借法自強的中國。1902年，梁啟超作〈過渡時代論〉，在庚子與辛丑之後的大幅度變法剛剛開始之際，言之明瞭地稱「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其意中的「過渡時代」，既是「希望之湧泉也」，又是常在「危險」之中而沒有歸路的過程，而下筆申說，於後一面尤其言之諄諄：

---

33 轉引自丁守和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5集，第432頁。

抑過渡時代，又恐怖時代也。青黃不接，則或受之飢；卻曲難行，則惟茲狼狽；風利不得泊，得毋減頂減鼻之懼；馬逸不能止，實維躓山躓堦之憂。摩西之彷徨於廣漠，閣龍之漂泛於泰洋，賭萬死以博一生，斷後路以臨前敵，天下險象，寧復過之？且國民全體之過渡，以視個人身世之過渡，其利害之關係，有更重且劇者。所向之鵠若誤，或投網以自戕；所導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屆。故過渡時代，又國民可生可死，可剝可復，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線，而所爭聞不容發者也。

因此，以「過渡時代」說「庚子國變」之後中國的大變，重心俱在「過渡時代」的「兩頭不到岸」。<sup>34</sup>他在20世紀開端之日預言後來，所以，章士釗稱他為「知更之鳥」。而十年以後黃遠生論世相，以民初比清末說：

晚清時代，國之現象，亦憊甚矣，然人心勃勃，猶有莫大之希望。立憲黨曰：吾國立憲，則盛強可立致；革命黨曰：吾國革命而易共和，則法、美不足言。今以革命既成，立憲政體，亦既確定，而種種敗象，莫不與往日所祈向者相左，於是全國之人，喪心失圖，皇皇然不知所歸，猶以短筏孤舟駕於絕潢斷流之中，糧糈俱絕，風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sup>35</sup>

同樣的意思，李大釗謂之「百制搶攘」而「國運」衰痿，「未意其扶搖飄盪，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風雨之摧淋，下有狂濤之盪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達，而舉目四顧，「固猶在惶恐灘中也」。<sup>36</sup>他們都身歷了這個過程裏的以變應變和一變再變，而眼中之所見，顯然是從清末到民初，中國人仍未走出過渡時代而依舊在兩頭不到岸之中。但梁啟超預想的「希望之湧泉」，則都已汨沒於「往日所祈向者」一一破滅之後的「喪心失圖」裏了。

34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六，第28–29頁。

35 黃遠庸：《遠生遺著》上冊，卷一，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88–89頁。

36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頁。

民初猶未走出清末開始的「過渡時代」，說明了兩者雖因國體不同而各成一段，而就社會變遷的歷史內容而言，則都同出於一個源頭而同屬一個過程。清末的變法與發生在社會深處的斷裂、脫節、四分五裂和發生在人心深處的倒錯、異變相為因果，並在君權倒塌之後都留給了民國。但清末能使「人心勃勃」的立憲和革命，在民初俱成了不可收拾的「種種敗象」，而致人在其中「不知所歸」，之後是曾經深信變法的人不再相信變法。戊戌年間懷抱急切之心作〈擬上皇帝書〉，力倡變法的嚴復，這個時候追本溯源，從頭說起，在一封信裏深論因果始末，痛訴本是同道的康有為、梁啟超：

嗟嗟！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為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為導師，以為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眾人視之，則以為福首，而自僕視之，則以為禍魁。何則？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覽之士，愀然恆以為難，不敢輕心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於道徒見其一偏，而由言甚易。

遂成其「狂謬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尤其指梁啟超純持「理想」鼓盪天下，「欲以無過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於最險直線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災已不可救矣」。<sup>37</sup> 這些話不能不算是言之銳利。然而以被議的康有為民初作「國會嘆」，自劾「追思戊戌時，鄙人創議立憲，實鄙人不察國情之巨謬也」，<sup>38</sup> 被議的梁啟超民初已變其「一往無回」而常在「懺悔」<sup>39</sup> 之中為對照，則其自己否定自己，又更具典型性和更富深刻性地表現了其時的曾經深信者變為不再相信。後來梅光迪說：「我國嚴復氏，不明歐人學術源流，輒以其一時流

37 嚴復著，王栻編：《嚴復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31–633頁。

38 康有為著，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882頁。

39 丁文江等：《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4頁。



行者，介紹國人。如所譯之《社會通詮》中，分社會進化階級，為圖騰、宗法、軍國，其影響吾國當時思想者至大。吾國人之自甘居於文化落後民族者，實此書作之俑也。」<sup>40</sup>於是痛詬康梁的嚴復也成被痛詬者。

比之辛丑之後的變法維新挾一邊倒之勢徑情直遂地前後相逐，這種先倡變法的人物此日之被人否定和自我否定，正明顯地說明，時至民初，曾在清末十年主導朝野而欲動人心的急變劇變，已被這一代人中的由希望而失望者置於事後省視之中，成了追而論之的究詰對象。康有為所說的「不察國情」，後知後覺地看到了與歷史中國斷裂的變法，因其脫空而起，文不對題，給現實中國帶來的其實是更多的攪動和淆亂。梅光迪指「自甘居於文化落後民族者」為大弊，尤其注目的是「歐化」淹沒了中體西用之後，一個沒有了本體和本位的中國，在浸灌而來的西潮面前只能跟著走的失其自我。嚴復深憾當日力倡移西法變中國的「康、梁師弟」之「於道徒見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則意在說明，十多年來以西學西法為一世開風氣的人物實際上並不真懂西學西法，從而並不真懂中國與西洋之間的異同。因此其「立言多可悔」，而風氣一旦演為萬竅怒號於天下，則已悔無可悔。與「辛丑、壬寅之後，無一人敢自命守舊」相比較，這些由辛丑、壬寅以來大變舊法，而所得「莫不與往昔所祈者相左」引發的深度質疑，正明顯地是在回歸於重新認識中國的本來和中國之固有。然則同屬過渡時代，其此一時和彼一時之間的觀念也在前後殊異的變遷之中。從曾經的「人心勃勃」到這個時候的質疑和回歸，是當初以「泰西變法三百年而強，日本變法三十年而強，我中國之地大民眾，若能大變法，三年而立」為預想的言之斷然，以及「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的危言警世，<sup>41</sup>由其簡捷明瞭的單面立論，衍化為清末最後十年一往無回的單面亢進之後，本與這個過程相為因果，從而

---

40 梅光迪著，羅崗、陳春艷編：《梅光迪文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3頁。

41 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311-312頁；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6冊，《專集》之一，第11頁。

被單面立論和單面亢進所遮蔽和迴避掉了的種種矛盾、逆反、衝擊、傾覆、動盪、瓦解、無序，以及隨這種掀簸而來的世路動亂，都在這個時候撤去了遮蔽，成為人人可見的事實而又直接殃及人人。因此，十多年來斷裂、脫節、摧折、四分五裂與人心的失措和異變步步累積而又不止不息，時至此日，時論已概括謂之曰「內變之烈，尤甚於外患」。<sup>42</sup>

就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而言，戊戌之前歷時三十年的借法自強起端於「萬不得已之苦心」和「內外臣工各有臥薪嘗膽之志」，<sup>43</sup>那一代人以「萬不得已」和「臥薪嘗膽」自述懷抱，既說明時至19世紀中葉，為回應西人的衝擊，中國已不得不變；又說明借法自強自始即立腳於體用本末之分，不得不向歐西借法的中國仍然是守定自我本位而不同於歐西的中國。以此為比照，則因甲午喪師而有戊戌年間的「大變」、「全變」；因庚子國難而有辛丑之後的「比照各國之法度」而「盡去舊法」，並由「大變」、「全變」和「盡去舊法」，引申而有「歐化」之說，雖然都是沿此前三十年中國的不得不變而來，但其重心已隨時勢逼拶化為人心危岌，由人心危岌化為四望迷離，全然不同地移到了中國的東洋化和西洋化一面。因此，後洋務時代的中國之不得不變，其理路遂以「舊之亡也勃焉，新之興也勃焉。支那欲立新國乎，則必自亡舊始」<sup>44</sup>為當然。這個過程使得合「各國之法度」為總稱的「新」，因其大而化之而越來越抽象，又使中國之為中國的「舊」，因其近在眼前而越來越具體，之後是危岌和迷離之下的除舊布新便只見舊的一面節節坍塌，而未見新的一面實隨名至。兩頭之間的矛盾無可化解，正說明一個「舊之亡也勃焉」的中國，因其沒有了立足的本體和本位，實際上又成了一個無從嫁接和消納「各國之法度」，以實現其蓬蓬然而新的中國。黃遠生筆下的「短筏孤舟駕於絕潢斷流之中」，李大釗筆下的「扶搖飄盪，如敝舟深泛溟海」，寫

42 經世文社：《民國經世文編》第8冊，第5193頁。

43 中國史學會：《洋務運動》第5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1頁；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奏稿》卷十二，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第7032頁。

44 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第92頁。

照的都是這個起於開新的過程在「亡舊」之後的兩無所依而不知歸宿。而作為曾經身在除舊布新的局中，而以文字動天下的人，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的否定和自我否定，是其立論的要旨，已由深信中國與東西洋之間能夠互通和共通了無窒礙，從而深信移東西洋之成法可以強中國的盲目一朝抉破之後，已變大信為大疑地反轉到由「立國自有本末」說中國與東西洋之殊異和隔閡，而以「妄師」東西洋成法只能亂中國為論斷：

瑞士不師羅馬，美不師瑞，法不師美，葡不師法，各鑒其弊而損益之，但取其合於本國之情，而為至善之止耳。今吾國何師乎？即採擇歐、美，豈能盡從？況於遠隔絕海數萬里之域，有亘古歷史民俗政教之殊，乃欲強移用之，削趾適屨，顧盼自喜，而不顧其流血也，豈不大慎哉！<sup>45</sup>

論其事實，他們都曾是「妄師」的開先者，因此，以此評說民初時事，其得自於跌挫起落的閱歷之知，又切近事理地為黃遠生和李大釗筆下的兩無所依而不知歸宿解說了由來和因果。

本被置於度外的「亘古歷史民俗政教之殊」此日被引到論述的重心之中，並由此省思，對比而見地直言「妄師」西國西法為大患，對於他們來說，由今時反觀往昔，已是歷經歲月滄桑和世路顛簸之後走出了曾經的盲目。然而以民初比清末，是時勢的逼拶仍在，則中西之對比仍在；中西之對比仍在，則危岌和急迫仍在；危岌和急迫仍在，則人心中的迷離仍在。在中體西用已經坍塌，而劇烈變遷之中的中國猶未能找到一種不同的理路和軌路，以越出清末以來的「稍稍窺竊於異國之學說」而「動以援引先例自豪」<sup>46</sup>之日，則歐西之聲勢仍然在以其廣罩四方而掀動一世，使人望而生畏，望而生羨。因此，當上一代人正由「今吾國何師乎？即採擇歐、美，豈能盡從」發為深度疑異的時候，繼起的後來人又在以法蘭西「文明」和「美國思想」為導引，闡說「變古之道，而使人

45 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下冊，第706頁。

46 孟森：《孟森政論文集刊》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816頁。

心社會劃然一新」<sup>47</sup>的暢想和懸想。法蘭西文明和美國思想，主旨仍然在大變中國，而其時的要義則已移到了文化一面。與「亘古歷史民俗政教之殊」相比，其遠看歐西的眼光顯然猶在辛丑、壬寅以來的慣性之中，而並沒有脫出一邊倒的單面亢進。這種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的嬗遞起於彼此各立宗旨，而又歸於前後周而復始，因此，同在兩頭不到岸之中，就古今中西之爭的內涵而言，是嬗遞有如循環。

作為一個過程，被梁啟超稱為「過渡時代」的這一段歷史，以戊戌年間維新變法的震懾和張厲為思想起點，又以庚子之變後「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的「大加興革」以「挽回厄運」<sup>48</sup>為實際起點。兩者合匯，既決定了這個過程內在的急切，也決定了這個過程縱深和廣延的一意遠伸和不斷遠伸。而與之相為表裏的，則是急切沒有定則，遠伸沒有止境。這個過程期望用西方人的辦法來解決中國人的問題，而後是秦漢以來的二千年歷史中國在西法的衝擊下新舊蟬蛻，失其本相。但過渡時代之「兩頭不到岸」，又說明西方人的辦法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過程，卻又為中國人帶來了更多的問題。時人謂之「舊宅第已毀而不能復建之，則惟有露宿」。<sup>49</sup>所以，對於身在其間的中國人來說，由變法開始的過渡時代，實際上成了最亢激的時代、最不安定的時代、最茫無端緒的時代和最趑趄徊徨的時代。由此顯現的是新陳代謝中的撩亂一面和危懸一面。

然而置這個過程於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之中而通觀前後，是過渡時代的斷裂、脫節、摧折和四分五裂，既以其一變再變的一路倉促，展示了傳統中國變為現代中國所經歷的逼迫之下以變應變的身不由己，又以其一變再變的一路倉促，展示了逼迫之下以變應變的惶遽和懵然。而以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立論，則與亢激、不安定、茫無端緒和趑趄徊徨對

---

47 陳獨秀：《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79頁；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0年，第8頁。

48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第（總）2771、4727頁。

49 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下冊，第714頁。

應的，是產生和形成於漫長歲月之中而被統稱為傳統的種種結構、秩序、關係、守則以及倫理和思想，在這個過程中由脫榫而脫裂，由脫裂而傾塌。同一代人的亢激、不安定、茫無端緒和趑趄彷徨相比，傳統的脫榫、脫裂、傾塌都留給了後來的中國，並會長久地影響後來的中國。而後是貞下起元，作為另一個過程，後過渡時代的社會變遷，其深處的歷史走向和歷史內容，便是為上下俱在瓦解之中的中國重造一種直立於古今中西之間，以攏聚和維繫蒼生的社會結構與人間秩序。直立於古今中西之間，則重造的過程，是本被置於兩端而互相對立的時代內容與千年歷史，歷經千迴百轉的重重變遷，在外來之物的中國化和歷史中國的現代化中而歸於合一。而後是時代內容不再陌生，千年歷史不再陳舊。因此，重造社會結構和人間秩序，同時又是在變盲目為自覺中重造中國的本體和本位。而過渡時代看不到結果的連年顛沛跌撲，也因之而在歷史的前後連續之中有了可以理解和認知的意義。

本書以「兩頭不到岸」為名，意在循其本來的源流相承和前後相沿，置晚清末期和民國初年於同一個歷史過程之中，由社會、政治和文化在這個過程裏發生的激變和劇變，尋究這種激變和劇變挾前所未有的烈度和深度造成斷裂、脫節、摧折和四分五裂的由來、內涵和結果。並以此說明過渡時代之後，以國民革命為起點的另一個時代繼之而起的原因和理由。就這一段歷史的矛盾、錯雜、人物之多變和世事的紛亂而言，我歷時五年的寫作，只能算是以有限的視野表達有限的讀史所得。

本書的出版，得到孫曉林老師、甘琦社長、毛升先生、陳甜女士、余敏聰先生和我的學生裘陳江君、王婧姪君的關照和幫助，在此向他們深致謝意。

楊國強

2021年11月